

# 母亲

(非虚构)

■ 静娴之子



钢笔彩绘《母亲》 文化周末特约插画师 杜娟 作

一直以来,都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在我的心头萦绕,那就是,在我辞世之前,要留下点文字,来纪念我的母亲。但每每提笔,刚写出几字,又无从延续,觉着自己的文字远不能表达自己的情感,又搁置下来,如是反复。

2020年的春节过得很是特别,因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迅速传播,加之自己感冒久治不愈,腊月三十右腿肚又突然生出个脓疮需要切除。既让我深深地感到生命的短暂和脆弱,又给了几日清静的时光,让我下定决心,重新拾笔。

## 1 坎坷的一生

母亲是个小人物,但她的命运却始终与我们这个国家的变迁紧紧地联系在一起,几经坎坷。童年、青年的母亲是在幸福中度过的。她出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安康城的繁华之地、小康之家。在中国,安康绝对是个偏僻之地,但因为汉江,古时交通与贸易依托航运,安康并不落后,被称之为中国的“小汉口”。母亲就出生在安康城最繁华的地方——中河街的一个小康之家。这里是安康当时最大的码头,最大的物资中转站和贸易中心。外祖父和外祖母都是从西安过来的,外祖父来时尚小,据说当过学徒、撑过船,后来在东家的帮助下成了家,开始贩卖陶瓷,逐渐有了家业。

因为走南闯北,外祖父是开明的,他让独子和两个女儿都在当时的安康中学上学。所以,与同龄的女孩比,母亲不光不用裹脚,还受新式教育,是安康城里少有的洋学生。舅舅也因为上过高中,后来入了公职,当了城关镇的镇长。

四十年代早期,母亲在从事抗战宣传的活动中,与时任安康中尉防空员的父亲相识相恋,并不顾双方家庭的反对,迅速结婚成家。抗战胜利后,父亲辞去了公职,与母亲一起以从教为生,从紫阳到旬阳。

解放前夕,父亲已是旬阳中学的校长。其时,国民党大势已去,主政旬阳的国民党书记、县长跑了,一时间旬阳无人主事。因为父亲的家庭背景和父亲的个人经历,乡绅们公推父亲出来暂时主政,旬阳和平解放。



解放后,父亲曾短暂就任白河县政府民政科科员,因为他长期不愿从政,又先后辞去了白河的公职,婉拒了再次安排的岚皋公职,与母亲带着全家再次返回安康,与舅舅一起经营陶瓷生意。公私合营后,母亲双双成为原安康县综合商店的职工。

文革前夕,1965年的深冬,因为父亲的历史原因,在民兵的押送下,我们全家被下放到父亲的老家,旬阳县大河南小磨沟殿山劳动改造。在这里,母亲与父亲白天在民兵看押下劳动,晚上,父亲挨斗,母亲陪斗。两年后,全家实在难以继续生存下去,为了子女们能活下去,父母商议着到旬阳县法院办了离婚手续,母亲带着全部子女返回了安康。

1966年到1968年下半年,安康城是在武斗中度过的,而我们全家因为没有户籍,没有住房,母亲带着子女们颠沛流离,东躲西藏,靠给城里人买炭砸炭度日,常常寄居在别人的屋檐下。

1968年下半年,重新成立了革委会,武斗结束,先是开展了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,紧接着在1969年,又动员居民下乡。为求一户籍,母亲和大哥商量后抢先报了名,69年深冬的一个清晨,在震天响的锣鼓声中,母亲和刚刚成人的二哥手捧着奖状,姐姐、大哥、我和妹妹胸前带着大红花上了卡车,将近一天的颠簸,在我吐得昏过去的时候,来到了我们的新家——原安康县双龙乡新华七队(后改为九队)。在这里,母亲和我们一住十年,和同队的农民们一起,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。



1979年,改革的春风在中国大地回荡。母亲和我们全家的命运迎来了新的转机,居民返城政策到了,母亲带着全家回了城,她自己又恢复了综合公司职工的身份,而此时,她已59岁,远过了55岁退休的年龄。但为了感恩,也为了养家,母亲主动申请留职,这一干,又是五年,直到64岁退休。

因为一生的颠沛流离和劳累,母亲积下了多种疾病,气管、肝、肺、肾的疾病在退休后集中爆发出来,三年时间,母亲就过世了。此时,母亲刚

满67岁,我也刚刚工作不久,尚未成婚,对母亲没有尽孝,是我一生的遗憾。

## 2 永不言弃的母爱

母亲一共生了六胎七个子女,除与大哥双胞胎的一子因病夭折,无论生活多么艰难,对子女,母亲从不言弃。这种顽强,是她骨子里的母爱。

第一胎生双胞胎儿子是大喜,这两个大哥,一个叫有典,一个叫有贵,看才出生的照片,一模一样,十分可爱。可百日过后,双双得病,一个不幸夭折,为了保住另一个,母亲想尽了办法,求遍了名医,最后还请了人算命,把大哥寄给了药王老爷,从此大哥就叫了药寄,大哥和以后出生的孩子就不再叫母亲叫妈,而叫姑。母亲颠沛流离,自己早期的照片,一张也没有保留,但双胞胎大哥的照片,母亲一直珍藏在身边。临死,还含泪端详。

我们全家随父亲到旬阳劳动改造时,因为子女多,日子过得十分凄惨,住在临时搭起的破棚子里,经常用谷糠、麸皮熬野菜汤度日。看到我们的状况,与父亲一同同胞的二爸提出把我过继给他,这样家里可少一张嘴。母亲坚决不答应,冒着生命危险抱着我连夜从陡峭的山上跑到汉江边,搭货船把我送到了安康城的舅舅家,自己又一个人返回。

与父亲离婚后,考虑到母亲独自带着六个子女的艰难,父亲要求把残疾的姐姐、妹妹留给他抚养,又被母亲一口回绝,毅然决然地带着全部子女离开了旬阳老家。

在母亲把我寄养在舅舅家的两年时间里,因为我无户口,与舅舅、舅母三个人吃着两个人的口粮。考虑到母亲的困难,舅舅私自做主让我改了口,叫他为大,舅母为妈。母亲从旬阳返回后,与舅舅大吵了一架,说“他是我身上掉下的肉,我就是饿死,也不能送人”。硬是把我带回了身边。很长时间,不再与舅舅往来,舅舅的屋檐下,自然也不能再住了。

妹妹是母亲一生的痛。生下不到一月,姐姐背着出去玩,两人一同从河堤摔到了河下,从此,两人成了残疾。姐姐眼睛成了半盲,而妹妹头骨从没有长严过,所以,她既没能上学,也没有劳动能力。1982年,母亲在给她的信中曾说到,“我死了,她怎么办?是你们的拖累呀!”。母亲之所以工作到64岁,还是希望靠自己的能力抚养妹妹。没想到的是,1983年水灾,在水里浸泡了一夜之后,妹妹体质急剧下滑,医治无效,在1984年先于母亲离开了人世。白发人送黑发人,握着妹妹的手,母亲悲凉地哽咽出一句话,“你先我走了,好啊!”

## 3 靠劳动生存

母亲的一生是艰辛的,尤其是她独自带着子女在安康城流浪的三年和在农村当农民的十年,几乎天天为了吃而奔波,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。但再艰难,母亲都坚持一条,靠劳动生存。

在安康城流浪的三年,是最难的。在计划经济时期,在城市,没有户口就意味着没有一切,没有住房,没有粮票、油票、布票、炭票,而且因为武斗,每天还要躲避战事、炮弹、枪子,面临死亡的考验,在小河街渡管所居住时,清晨起床,我曾亲眼目睹同在此居住的江爸被一枪击中,当下毙命。

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,已经工作的大哥和刚刚成年的二哥参加了武斗一派“六总司”的战斗队,不光让家里少了两张嘴,偶尔还能贴补点家用。但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,一家人吃饭怎么办?母亲从老邻居处借了几把炭锤,带着姐姐、三哥挨家挨户求人,给人砸石炭,砸了要么给点吃的,要么给几角钱工钱。慢慢的,有了一些固定的雇主,母亲就凑钱买了辆架子车,带着子女们靠给人买炭、送炭、砸炭为生。雇主们都把炭交给母亲,母亲每天抱着一摞炭本早去大北门、小北门炭厂买炭,再挨家挨户送到,砸碎。



那个年代,样样短缺,石炭也如此。砸炭容易买炭难。难,主要是难站队。炭厂规定,站一个队可以买200斤炭,所以从四岁就跟着大人一起开始了谋生。每天凌晨4点左右,我就被母亲叫醒,迷迷糊糊随着母亲一起去炭厂站队。我的任务就是站队凑个人数,反正站一个队200斤炭,没有规定大人小孩,炭厂的人也知道我们家可怜,从来不计较。八点上班,开始装炭后,我和母亲、姐姐、三哥一次就可以买800斤炭,能凑够一架车子,这一架子车炭从买到送到砸,全家人就能勉强度过一日。炭厂也休周末,周末就是我们最难熬的日子,摸不到砸炭和其他的活,全家就得挨饿。每到这个时候,母亲就一个人出去借,我们在家等。有一次,母亲从早上出门,中午一点还没回来,为了抗饿,我和三哥就打赌,看从河朝上走的人多还是朝下走的人多。这一日,母亲到晚上八点才借回了一小袋绿豆,我们饿极了,赶紧用炒黄豆充饥。

砸炭之外,母亲偷偷干了第二职业,就是在汉江打捞漂浮的尸体并掩埋。武斗期间,安康大的派别主要是“六总司”和“红三司”,“六总司”以安康城为主,“红三司”以农村为主。从文斗转为武斗后,汉江上游经常会有尸体漂浮下来,“六总司”就认为是被“红三司”沉河的自己人,让人打捞并掩埋,按人头给20元。这活一般人都不敢干,恶臭事小,太害怕了,但20元钱,确实不少。邻里当过船工的招财大老戴就组织起来,见有尸体漂来就集体行动,活干完了领钱均分。因为是老邻居,母亲就央求着每次带上她。邻居们都知我们家的情况,没有办法也就只好带着。后来大哥知道了,央求母亲不要去,母亲说,“母

亲凭劳动养家丢人吗?”大哥知道母亲的个性,就不再吱声。武斗期间,安康城干这活的女人,就母亲一人。

下放双龙时,大哥已经工作,是母亲带着二哥、三哥、姐姐、妹妹和我六人。农民是靠工分分钱分粮的,而没有劳力就没有工分。才下乡时还好,二哥算个主劳,母亲算个半劳,但时间不久,二哥上“三线”修铁路了,因为能吃苦,又有初中文化,当排长、连长招工走了。二哥招工回城,母亲自然高兴,但农村就剩下母亲半个劳动力。看到她拖着单薄多病的身躯日日出勤,栽秧、锄草、浇粪、修田,甚至和男人们一起抬石头,残疾的姐姐就把家务全部都担了起来。刚刚到校读书年仅12岁的三哥也主动辍了学回到生产队,从12岁到22岁,从一个劳动日1.5分干到满劳10分。

为了多挣工分,也为了贴补生活,母亲带着全家搞副业,养蚕、养猪、养鸡。每年母亲都争着给生产队养蚕,春秋两季可以养1.5到2张蚕。每张产量和茧价好了,就可以挣300到400个工分。养猪是为了改善生活,一头猪杀了要管全家一年的肉食和炒菜用的油。养鸡则是为了卖鸡蛋,卖的钱主要是买盐和给我与妹妹交学费。我放学后主要的任务就是打猪草和到同盟沟背石炭。

农村有一句农谚,“要吃牛肉往岩里掀”,是说除了摔死,农民是不会杀牛吃肉的。我们在七队住了10年,一个冬季生产队还真摔死了一头牛。队里没人会剥牛,请了一个下放到另一个生产队的回民来剥牛。开膛之后,一头牛不到一个拳头大一疙瘩牛油,我亲眼看到,剥牛的师傅一口把牛油吞进肚里。

生产队有19户,队里就把牛切割分了19堆,17堆肉,2堆骨头。母亲十分为难,围着转了两圈,才下决心抱回家一堆牛骨头。这一周全家人就像过年,吃了一周的牛骨头炖萝卜,别提有多高兴。

1979年,居民返城的政策落实了,母亲带着三哥、妹妹回到了城里,姐姐因为已经成家而留在农村,我因初中毕业留村当了知青。回城后,母亲在原单位复了职,59岁的她就像焕发了青春一样,没日没夜地工作,经常两三个月不休一个周末,后来当了丁字街门市部的主任,干脆在拥挤潮湿的商店仓库里支了一张床,不回家住了。1981年10月13日晚8时,母亲在晚饭后去商店的路上被车撞伤骨折,“伤筋动骨100天”,但母亲只住院一月,在家里休息了10天,就拄着双拐去上班了。母亲在信中对我说,“因为我们是合作单位,所以母亲还是要咬紧牙关,要求出勤,因为母亲的特性,就是要自立和主动。”



1982年底,母亲已62岁,工作仍毫不懈怠。母亲给我来信说,“母亲虽已年迈,工作的担子反而加重。今年母亲住门市部,母亲的心思你知道,就是要感谢党的落实政策,更想站好最后一班岗”。

1983年3月,母亲又病了,但她仍不停歇。信中她对我说,“母亲从3月1号病到8号,很少起床,9号勉强爬起来,10号就带病出动了。为啥?母亲肩负着门市部的往来手续,既为了完成上年的工作总结,又是为了当年的春季基础。三个月没有盘点,不能因母亲一人影响单位。”

1983年7月,我毕业了。如母所愿,我回到了安康,分到了地区农业部门。上班的第一天,我对母亲说:“我工作了,您该歇歇了。”母亲同意了,说是该休息了,但是她的申请还没递交,“7·31”洪水袭击了安康,因为母亲负责的门市部在城堤外,为了抢运货物,在大水进城之后,母亲未能撤离,与三哥、妹妹绑了一个木排,爬上我家旁边的四楼顶上,在洪水中浸泡了一夜,幸免于难。之后,退休的事也不再提起。母亲和全家一起抗洪救灾、抢运货物、恢复营业,又咬牙坚持了一年,一切恢复正轨,1984年她才办了退休,此时她已64岁。

## 4 教子女做对社会有用的人

母亲是上过学的,对每一个子女,她都希望她能读好书,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但事与愿违,大哥上完高中,高考全省第二,因家庭原因未被录取,走上了工作岗位。二哥刚上完高小,姐姐上完小学,全家劳动改造上了殿山,失学了。三哥比我大四岁,文革学校停课,我们全家下放到双龙后,已经12岁的他才与我一同报名上了一年级,一学期没上出来,又退学当了农民。对于这一切,母亲十分伤心,但又无能为力。为了教育孩子,她只好尽自己所能来弥补,文革期间,我们全家每晚都是拥成一团挤在别人屋檐下过夜,但我都是在母亲的故事中迷迷糊糊进入梦乡的。从《西游记》《三国》《孟母三迁》《红楼梦》《精忠岳岳飞传》《哪吒》到“从前有座山,山上有座庙,庙里有两个和尚,老和尚在给小和尚讲故事……”,等等,等等。

在我的小学阶段,母亲无论白日劳动多么辛苦,都会在煤油灯下为我和同院的孩子辅导作业,也正因此如此,同院的三个孩子很快就成了班里的学习尖子,我当了班长,罗长生当了副班长,王立勤当了学习委员。

三哥退学后,母亲给了我一个任务,每晚要把白日在学校所学教给三哥。我和三哥就上山找了一块石板,每日放学后,我都把老师用过的粉笔头拾回,回家后在石板上给三哥授课,三哥的文化是我传授的。

我报名上学的第一天,母亲在我的本子扉页上工工整整写下了12个字,“政治上向上看,生活上向下看”,八岁的我不知“政治”为何物,母亲就说:“听毛主席的话,做正派人。”

对我的学习,母亲不要求分数第一,但要求每学期必须是“三好学生”,要德、智、体全面发



展。那时一个班40到50个学生,“三好学生”少了3名,多了5名,评上是很困难的。五年级的上学期,我没有拿回“三好学生”的奖状,母亲对我施了最严厉的家法,让我跪在乏碳(烧过的石灰)上几个小时。这还不行,第二天又带着我到学校见马兆林校长,要给我退学。在我反复表态和校长求情下,母亲才同意我继续读书。

1978年,我初中毕业了。对我,人生第一次面临重大选择,是上高中,还是读中专。对于刚刚恢复高考又处于困难时期的中国,考中专先就业几乎是所有人的梦想,但一个偏僻乡村学校,考上中专又近乎天方夜谭。而上高中,就意味着要继续被家庭供养,这是我们家当时的能力所不具备的。母亲开了家庭会,哥姐无人表态,高中中我从无缘。第二日天蒙蒙亮,当同班的几位同学敲我家的门窗,喊我同去岚河考高中时,我和母亲都装作没听见。听着同学们的脚步声渐渐远去,我再也忍不住,蒙着被子大哭起来,母亲坐在床沿,拉着我的手陪着我哭,许久才颤抖着说“儿呀,家里困难,妈没有能力呀”。

后来中考考试揭晓,我成了全乡唯一初体检的初中生,但体检结束,又在政审环节被卡掉。我彻底崩溃,回村当了农民,但母亲却鼓励我,“儿子,记住,天生我才必有用。”

当了两年农民,1980年中考,我再次被录取,这次政审也通过了,我被陕西省农林学校录取了。母亲比我还高兴,离开家的头一天晚上,在灼热的牛毛毡棚里,母亲一夜未眠,一边给我收拾行装,一边反复叮嘱:“儿呀,你一定要珍惜这次学习的机会呀。”

中专三年,母亲靠自己微薄的工资,帮农村的姐姐,养病弱的妹妹,资助我上学。每来来信,总是要求我上好学做好人。

到校三月后,母亲汇来15元钱,并附亲笔信。信中说,“本月汇元壹拾伍元,望儿一点一滴用于正途,并千万不可自行拉帐。”信中还说,“母亲对你最大的希望和要求,就是坚持好好学习,力求上进,端正为人。母亲的性格,儿是知道的,虽风烛残年仍努力发光,儿千万生活低处看呀!”之后,母亲仍不放心,第二月又来一信,“希望你一步一步努力学习,生活要向下看,成为一个艰苦朴实的好青年,能成为端正的社会主义战士,这样,才不辜负母亲在困难时对你的帮助。”

1982年的春节,考虑到家里困难,我告诉母亲寒假准备留校勤工俭学,母亲立即来信,“儿放假必须回家同老母一同过春节。家中虽困难,儿不必怕什么,母亲平生都是在艰苦中度春秋,只要全家在一起,这样的日子,母亲认为我们仍然是幸福的。母对儿的希望,脚踏实地、努力学习、认真讲求‘五讲四美’,学好、做好就对了,不要形式主义。”

毕业前夕,面临择业,我征求母亲意见。母亲来信说,“你以后干什么,母亲能力有限,主要是靠你自己品学兼优,这就是基本的本,将来一切的一切。”

## 5 永远的记忆

龙应台在《目送》中说,“所谓的母子一场,只意味着你们的缘分,是今生不断的目送着他们的背影渐行渐远”。我的感觉是反的,母亲离开我已33年了,我也马上到了“花甲”之年,但母亲单薄消瘦的身体,慈祥温暖的笑容,却在我脑海中愈来愈清晰,与母亲的心灵对话也越来越多。母亲没有离开我,她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我。

从大哥开始,我们弟兄都是背着铺盖卷离家的。但母亲在,家在,根在。母亲走了,我突然没了家,就像空中飘浮的叶片,不知落向何处。这个时期,我的情绪低落到了冰点,但看着母亲的遗照,一遍遍读着母亲过去留给我的信件,我看到了未来的方向和生活的动力,坚定地走了下去。

母亲过世三年后,我结婚了,没有仪式。我带着新婚的妻子来到了母亲的墓前,跪拜之后,我清晰地看到母亲慈祥温和地在向我微笑,清清楚楚听到母亲在我耳旁说,“儿呀,成家不必成童日,立室宜知立志时,切记切记!”我谨遵母亲的教诲,努力做着好干部、好丈夫、好父亲。这个时期,我事业爱情双丰收,是母亲在影响着我。

九十年代初,我人生一度跌入低谷,事业走了下坡路。很长时间,身体多疾,久治不愈,我心灰意冷,十分颓废,一度到了崩溃的边缘,我甚至与妻子都开始交代后事。我在漫无边际地行走中独自来到了母亲的墓前,在大哭一场之后,我点燃了一根烟敬奉给母亲。静默中,我又清晰地听到了母亲的声音,“儿子啊,这是啥事?想想我的过去,想想母亲。苦难,是人生的财富,你要学会把这笔财富用好呀。”我默默地坐在母亲墓前,听着母亲的教诲。两个小时之后,我站起来,深深地鞠了三个躬,离开了墓地。这之后,我不再迷茫,从市上到县上,再从县上回到市上,经历了多个岗位,有喜悦,有成功,也有挫折。母亲的身影,总是伴随着我,让我不再退缩、迎难而上,宽厚待人待事,从严于律己。是的,直到今天,是母亲一直在引领着我。

郑振铎说:“成功的时候,谁都是朋友,但只有母亲——她是失败时的伴侣。”我的母亲,她给了我身体,也给了我灵魂。我开心时,她和我一起笑;悲伤时,她为我抹去泪水。她是我的脊梁,我的舵手,我们的骨血、灵魂深深地融合在一起,永远伴随着生命的节律前行。